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POST-MARXISM VERSUS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Politics and Intervention

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

理论、政治与介入

[英] 保罗·鲍曼 著
黄晓武 译



NLIC 2970692894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POST-MARXISM VERSUS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Politics and Intervention

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

理论、政治与介入

[英] 保罗·鲍曼 著
黄晓武 译



NLIC 2970692894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理论、政治与介入/[英]鲍曼
(Bowman, P.)著;黄晓武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2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6707-4

I. ①后… II. ①鲍…②黄… III. ①马克思主义—
研究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8725 号

Post-Marxism Versus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Politics and Intervention

Copyright © 2007 by Paul Bowm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nburgh University Ltd.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0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9-093

书 名 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理论、政治与介入

著 者 [英]保罗·鲍曼

责任编辑 王 溪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9.5 插页 4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707-4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译者的话

作为当代学术话语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都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对战后英国现实社会和学院政治中存在的问题的反应,都力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还原论和阶级本质主义的批判,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传统,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活力。正如本书作者保罗·鲍曼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应对政治和知识领域以及相关领域中的某种“危机”而出现的,“都起源于一种介入式的努力,它们也主要地把自身当成一种介入式的努力,试图挑战、清除或至少去发展既有的并且通常广义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政治因果关系模式、介入模式以及关于是什么最终决定了事态、身份和对象的各种理论模式”。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与霸权理论在文化研究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视作文化研究中继“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之后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话语理论也被视做是对文本理论的超越。

《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一书对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发,在本书中,保罗·鲍曼要探讨的并不是后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的简单的一致性和承继关系,而是两种学术话语之间存在的紧张的冲突性联系。因此,在本书的标题中,他所使用的连接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这两个概念的词是 *versus*,也就是说,强调的是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这一短语中的这个‘与’实际上遮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远不是单纯的、固定的、直接的。为了质疑政治上有影响力的介入的确定和实施问题,现在有必要进一步澄清的是,连接文化研究与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与’字实际上应该是‘相对于’。把文化研究和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使二者产生分裂和矛盾的东西。”本书中文译名没有使用“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的对立”或“后马克思主义对抗文化研究”等直接的说法,而是采用了《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这一更宽泛的说法,是出于书名的考虑,但我相信,读者通过自己的阅读是能够从本书中体会到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对立、冲突”的含义的,而中文中的“与”本身也具有这样一种对立、比较的义项。

保罗·鲍曼认为,把文化研究与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使二者产生分裂和矛盾的东西正是解构主义,也就是说,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都是解构主义的,但二者对解构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是不一样的,这不仅从不同的方面决定了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以及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不同,也决定了它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因此,用鲍曼的话来说,本书要关注的,就是“解构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的”文化研究。他认为,解构主义对于后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政治是极其重要的,对于文化研究如何理解文化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与解构主义的不同关系中,或在解构主义的不同运用中,汇聚了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冲突的本质和主要内容。

鲍曼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话语理论上,话语理论解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把万事万物的决定和经济或阶级层面的某些“本质”联系在一起的作法,把客观现实本身和人的主体性都视做话语性的建构,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点就从事物的客观性转向了这一客观性的可能条件,也就是拉克劳所说的“任何客体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斯图亚特·霍尔对拉克劳的话语理论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拉克劳和墨菲对政治主体概念的解构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且认为话语隐喻构成了这一时代的理论革命。在文化研究中,霍尔对拉克劳与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评论被当成了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的第一次建设性相遇,认为它为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但穆维特认为,话语理论有其局限性,话语揭示了一类特定的现象是如何表现自身从而使自己成为文化研究的关注焦点的,但“现象”从来都不是自然地或中性地在学术审视前再现自身的。在穆维特看来,特定的现象是通过学术话语展现自身的,是通过制度性的建构而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对待研究对象时,采取了一种外部视角,它关注了对象自身的话语建构,但没有关注学术话语自身对对象的建构。也就是说,“后马克思主义话语范式实际上**遮蔽**了学术思想实践问题框架中的某些重要方面,**遮蔽**了学术思想实践的政治意义,以及它们作为‘介入’或面向‘介入’而进行思考和实践的能力”。

这也就是说,话语理论虽然超越了文本理论中“能指的无限滑动”的缺陷,使关注的焦点集中到意义的对抗和权力的构建作用上来,但文本理论对学科性的关注却是话语理论所缺乏的。文本分析坚持认为,建构的偶然性不仅仅是外部的,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学科内部的。正因为这一点,穆维特提出,文本深陷于学科政治中,“它不仅是重构学科边界的努力的一种表达……而且也是一种批评性实践,

力求对学科影响下的文化工作提出质疑”。他认为,文本理论对于理解学科自身的构建或其研究对象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而后马克思主义则完全相反,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保留了学科领域中主—客体之间的区分的完整性,并因此“确认”了学科作为主体去认知各个领域以及“外部”对象的安全性与合法性,而没有对学科边界本身提出质疑。于是,对穆维特来说,文本的政治意义和资源来自于他所说的文本作为一种“反学科对象”而潜在发挥的作用,它可以在学科及其制度内外促成生产性的、伦理—政治上的深刻危机。而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在另一方面则是“学科化”的,它有助于维护既有的学科建制和关系。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从文本理论到话语理论的发展就必须倒过来看,话语理论并不能完全取代文本理论,文本理论也能为话语理论提供资源。

和穆维特一样,鲍曼对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对立冲突的关系的看法也是从学科性出发的,可以说,学科性是他探讨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框架,这也是本书不同于其他关于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的著作的地方,它时刻对学术话语自身所处的制度语境及自身与这种语境之间的关系保持一种解构主义的警醒,用鲍曼的话来说,就是始终面向大学,始终面向学科本身。那么,这种理论的反省会不会脱离社会现实,使知识分子的实践无法实现真正的介入呢?鲍曼认为,承认学术工作的制度性基础,并且努力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展开工作,这并不会使理论倒退回不关心世事的状况,造成理论的自恋,相反,它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新起点,从而对实践与介入进行重新思考,而这种重新思考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保罗·鲍曼从解构主义角度对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的关注直接来源于德里达对大学的责任的阐述,也就是关注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作为学院的学术活动所具有的政治内涵。在他看来,与解构主义一样,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都不仅仅是理论性的、程序

化的,而是力求介入直接的、广泛的、制度性的社会—政治语境,其指导思想目标是“建立伦理—政治上负责任的、能产生实际效果的‘实践性’介入”。文化研究和后马克思主义在构成上都以介入为方向和目标,然而同时却又无法确定这种介入应当是什么样的、可能是什么样的。鲍曼认为,在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中,作为核心概念的“介入”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说明,这种理论上的盲点是与它们各自的范式框架联系在一起的,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那些以介入为目标的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脱离现实的矛盾倾向。《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一书在阐明文化研究与后马克思主义在介入问题上的盲点的同时,试图提出一种新的介入理论,为学术活动的介入实践寻找新的动力和方向。正如鲍曼所说的,“本书主要不是‘关于’霍尔、拉克劳或其他任何著名理论家的,而是关于如何建立负责任的学术—政治参与和介入问题的,实际上是关于大学的责任问题的”。

保罗·鲍曼教授是英国文化研究、流行文化、文化理论学者,英国利兹大学博士,曾任教于伦敦罗汉普敦大学,现任教于英国卡蒂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主讲文化理论与文化政治,对文化研究的发展及其局限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对体制性的学术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是其代表作之一,于2007年4月由英国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其他著作还有:《解构流行文化》(*Deconstructing Popular Culture*, Palgrave, 2008)、《对布鲁斯·李的理论阐释》(*Theorizing Bruce Lee*, Rodopi, 2009)等,编有《文化研究探讨:理论、政治和实践》(*Interrogating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Politics and Practice*, Pluto Press, 2003)、《齐泽克的真相》(*The Truth of Žižek*, Continuum, 2007)、《阅读朗西埃》(*Reading Ranciere*, Continuum, 2010)、《周蕾读本》(*The Rey Chow Rea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等著作。鲍曼教授从大学的责任和学科性角度出发,对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

所作的理论反思值得国内学者关注,它使我们意识到学术研究自身的局限性,对学术中的自大态度保持警惕,同时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力使学术知识为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提供资源,发挥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作用。

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国内已有中文译本,尹树广先生使用了《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的译法,因为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理论显然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获益良多,而 hegemony 译为“霸权”还是“领导权”在关于葛兰西著作的翻译中也有过各种热烈的讨论。在本书中,鲍曼在很多地方提到了霸权,指的是权力在各种话语中的强力运用,而不仅仅限于对拉克劳和墨菲的这一著作的讨论,因此,为了统一,我们使用了《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这一译法。

黄晓武

2010年4月

致 谢

感谢以下各杂志和出版社,允许我在本书中收入以前发表的文章,它们分别是: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允许我收入发表于《爱丁堡现代理论与批评百科全书》(*The Edinburgh Encyclopaedia of Modern Theory and Criticism*, 2002)一书中原题为《欧内斯托·拉克劳、尚塔尔·墨菲与后马克思主义》的一章,主编为朱利安·沃尔夫雷斯(Julian Wolfreys);《文化机器》(*Culture Machine*)杂志,允许我使用《越界者的责任》一文的部分内容,最初发表于《文化机器》第6期(2004),网址为:<http://culture-machine.tees.ac.uk>;泰勒-弗朗西斯-路特里奇出版公司(Taylor & Francis/ Routledge,网址为<http://www.tandf.co.uk>),允许我使用以下三篇文章的内容,它们分别为:《对革命的混杂的忠诚:或重新评价“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最初发表于《当代政治学:新议程和全球探讨》(*Contemporary Politics: New Agendas and Global Debates*)第9卷第1期(2003年3月);《完全的不恰当:文化研究的诸种性质》,最初发表于《视差》(*Parallax*)第7卷第2期(2001年4—6月号);以及《在责任与不负责任之间:文化研究与鱼的价格》,最初发表于《多重战略:理论、文化与政治杂志》(*Strategies: Journal of Theory, Culture and Politics*)第14卷第2期(2001年11月)。

我还要感谢以下各位的关心与支持,他们是:巴巴拉·恩格(Barbara Engh)、马克·德文尼(Mark Devenney)、托马斯·多彻蒂(Thomas Docherty)、杰里米·吉尔伯特(Jeremy Gilbert)、盖里·霍尔(Gary Hall)、库尔特·希尔特勒(Kurt Hirtler)、欧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马丁·麦克奎兰(Martin McQuillan)、约翰·穆维特(John Mowitt)、格里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阿德里安·里夫金(Adrian Rifkin)、理查德·斯坦普(Richard Stamp)、马塞尔·斯温伯达(Marcel Swiboda)、乔安娜·齐林斯卡(Joanna Zylinska),以及长期以来遭受我折磨的本书编辑本杰明·阿尔迪蒂(Benjamin Arditi)和杰里米·瓦伦丁(Jeremy Valentine),尤其要感谢杰里米·瓦伦丁,他对本书的各个修改稿都进行了细致的评论,提出了很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感谢我的父亲乔治·鲍曼(George Bowman, 1937-2003),即使他没有机会阅读这本书,感谢他始终给予我的关心、支持、肯定和帮助。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鲍曼一家和汉密尔顿一家,以及艾丽斯。

前 言

在一篇论“大学的责任”的文章中,德里达写道:“我不知道今天是否还存在一种关于大学的责任的纯粹概念,也不知道由一种或几种传统孕育的伦理政治符码是否可以对这一概念作出界定,”他接着说,“但是,今天,对于一个在研究机构或教育机构工作的人来说,最基本、最有趣、最具创新意义、最具责任感”的行为,就是把各种阐释中关键的、复杂的洞察所具有的“政治内涵”“尽可能清晰地、主题鲜明地”表达出来,“对于某个理论命题、某首诗歌、某个哲学命题、某个神学命题的阐释,只有在同时提出了一种制度模式时才能产生,不管它是结合了一种现有模式,还是创造出了一种与它自身相符的新模式”。^① 这就是说,各种阐释——关于任何事物的——都要求阐释者采取“这种或那种制度模式”。德里达补充道:“这就是文本的一般法则。”本书要关注的就是这一“文本的法则”。德里达接着说道,然而阐释者并不是“消极地听从于”制度模式的各项指令;所有阐释者“自身的阐释行为反过来也会构建出一种或多种共同体模式”。但阐

^① Jacques Derrida, ‘Mochlos; or,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in Richard Rand (ed.), *Logomachia: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Lincoln, N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2, p. 21, p. 22.

释也不是“自由的”：阅读或阐释不能脱离制度性实践的复杂陷阱，不能脱离它所在的语境的制约。阅读或阐释不是“自然的”，也不必然“正确”。相反，它总是处于制度中，并且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实际上，德里达甚至认为，制度本身并不是自由的、独立的，它们复杂地交织、纠结、联系在一起，并和其他制度相结合。在不同的制度、其内部行为、其相互之间的行为和语境、处所和场景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复杂性和相互联系。德里达挑战性地提出：“例如，当我在某个给定的文本中读到某个句子，或在某个研讨班上读到某个句子时……我并不是在履行一份先前约定的合同。我也可以和某一制度拟定一份新合同，并准备签署一份新合同，在这一制度和社会的主导力量之间签订一份新合同。”^①正是德里达所要求的这种复杂文本性的“政治内涵”，应当“尽可能清晰地、主题鲜明地”表达出来，用“最经典的标准”来说，就是：

我所说的尽可能清晰的、主题鲜明的表达指的是，我们认为或者说我们承认，我们和学生以及研究团体所从事的每一种行为中（阅读、阐释、构建一种理论模型、推理论证、处理历史材料、甚至包括推导数学公式）……都有一种制度性的概念在起作用，都暗含了某种约定，都构建了一种理想的讨论模式，都暗含、重复或替换了某一场域，创造、转化了某一场域，也危及或破坏了某一场域。制度并不仅仅是几堵墙，几座外在的建筑，为我们的研究自由提供保护和保障，或者对这种自由作出限定；它同时也一直是我们的阐释结构。^②

德里达把这一点看成是解构主义关注的首要问题。从这一方面来说，解构远不仅仅是“理论性的”。相反，按照德里达的说法，“如果说有任何影响的话，那么我们目前所谓的解构主义绝不是一套技术性的话

① Jacques Derrida, 'Mochlos; or,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in Richard Rand (ed.), *Logomachia: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Lincoln, N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2, pp. 21-22.

② 同上书，第22—23页。

语程序,也不是在某一给定的、稳定的机构的庇护下可以运用于档案或言说的一种新的阐释学方法;它至少也是在研究中,在面对各种政治—制度结构时,采取的某种立场,这些政治—制度结构构建和控制了我们的实践、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行为”^①。

正是因为解构主义从来都没有仅仅关注意义的具体内容,它才不能脱离这一政治—制度问题框架,并且必须对责任问题提出新的质疑,这一质疑不应该继续使用已有的政治学或伦理学符码。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有些人看来解构主义的政治性太强了,但对那些根据战争打响前的路标来认识政治问题的人来说,却是涣散军心的。解构不应当只是一种有助于巩固现有结构的方法论上的创新,也不应当成为其反面,成为一种不负责任的夸耀或不负责任的破坏行为,这些行为最可能的结果是使事物保持原样,并把大学中最保守的势力结合到一起。^②

从这些思想出发,本书要关注的就是“解构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文化研究。对这两方面的关注直接来源于德里达对大学的责任的阐述,在这些论述中,德里达提醒我们要注意大学中的研究和学术活动所具有的政治内涵。事实上,正如我在第一章中将要论述的,文化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出于同样的伦理和政治动机的制度性实践,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类似。二者都不应当仅仅是形式化的或程序性的,它们都力求介入直接的、广泛的、制度性的社会—政治语境,用斯图亚特·霍尔的话来说,都希望制造出一种“真正”的差异。^③

考虑到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中极具影响力的地位,本书第一

① Jacques Derrida, 'Mochlos; or,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in Richard Rand (ed.), *Logomachia: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Lincoln, N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2, p. 23.

② 同上书,第 21、第 22 页。

③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Lawrence Grossberg, Cary Nelson, Paul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

章阐明了霍尔关于文化研究的存在理由和操作机制的重要概念,这些概念影响深远,它表明霍尔的理论基础跟解构主义相关,同时更重要的是跟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的解构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相关。^① 这种“后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视角,它把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都当成是不可还原的“话语性的”东西。从一开始,并且一直以来它的特征都是,用一种不可还原的解构主义视角来看待文化、社会、主体性甚至所有的知识和政治范畴:它的核心概念包括偶然性、建构的偏见和政治性、身份的“不可能性”或“构成上的不完整性”,等等。第一章也表明,拉克劳和墨菲^②关于文化和政治是偶然的和霸权性的理论在文化研究中具有深远影响。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对文化研究本身所带来的影响经常被忽略了。但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简单地指出这种关系,本书要探讨的是在这种复杂的“影响”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这和我们一开始就谈的德里达解构主义中的复杂的或被复杂化了的^③政治概念有关。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德里达拓展了政治思考和政治概念的范围,使它无法脱离制度性的、最终是文本性的语境。因此,本书所要探讨的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的“问题”就和学术—政治责任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所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对什么负责?承担责任或者说负责任地、有意义地、有效地介入指什么?介入什么对象,又如何介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本书认为,它们应当被看成是文化研究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框架。然而,尽管这一问题框架是“理论性的”,它却不应当仅仅是“学院式的”。在“大学的责任”这一标题下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冲突最终是政治效果的问题。它是与造成的影响密切相关的。

当然,对许多人来说,更为基本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要用一种德里达式的术语联系起

①② Ern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London, 1985.